

曾经

all those days

赵

长

天

著



文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曾经/赵长天著. —上海: 文汇出版社, 2007.1
ISBN 978-7-80741-131-4

I. 曾... II. 赵... III. 纪实文学-中国-当代
IV. 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154110号

曾经

作 者/赵长天

责任编辑/朱耀华

策 划/L & L International Ltd.

特约编辑/张予佳

装帧设计/



出版发行/文汇出版社

上海市威海路755号

(邮政编码 200041)

经销/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/上海长阳印刷厂

版次/2007年1月第1版

印次/2007年1月第1次印刷

开本/787×960 1/16

字数/100千

印张/13

印数/1—6000

ISBN 978-7-80741-131-4

定价/22.00元

曾经

人人都有曾经的日子。因为已经逝去，那些日子就变得非常珍贵。其实未来的日子同样珍贵，但曾经的日子是具体的、实实在在的，而未来还只是一串代表日期的数字。

曾经的日子越来越多，未来的日子越来越少；当然，未来更珍贵。珍惜未来就是珍惜生命。珍惜生命的办法，就是别忘记曾经的日子。阅历永远是最宝贵的财富。

每个人的曾经都宝贵。千千万万人的曾经就构成了历史。历史不是抽象的道理，历史不只是改朝换代，历史存在于每个人的生命之中。

下面的文字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自传，只是一些片断的记忆。不是按照重要与否选择的结果，是自然筛选留下来的，并且难说记忆是否有误。所有的回忆录都难以绝对准确。但任何自然存在的东西都是有道理的，包括自然；留存的记忆。这许多琐事，许多细节，是我生命中的烙印，我珍惜它们，所以我把它们奉献给读者。

成人前的记忆

我的家 /2

过节过年 /7

民以食为天 /17

真实的童话 /21

声音是有质量的 /25

孩子王 /29

舞台梦 /38

游泳及其他 /43

两个国家的恋爱史 /51

难忘的老师 /55

争做“卑贱者” /61

行 走 在 革 命 的 边 缘

革命来了 /64

我们成了“保皇派” /68

革命的旅行 /72

去见毛主席 /75

当一回“造反派” /81

实习装卸工 /85

在 海 拔 4000 米 的 地 方

新兵蛋子 /90

越西，我的雷达站 /94

土匪和山火 /99

业余筑路队 /106

初上黄毛梗 /111

关于故事的故事 /116

非供观赏的风景 /119

高山观奇 /128

电影的“黄金时代” 135

我曾经这样生活 /138

抓狐狸 /144

卫生员的悲喜剧 /151

报道组 /156

“9·13事件” /162

小文工团的生活

五石村 /168

“我是何训友” /171

有趣的徐哲林 /178

革命时期的爱情 /184

父亲最后的日子 /191

童年，是一生中最无忧无虑的日子。贫困也罢，艰难也罢，都由成年人承担着，孩子总是穷开心。孩子的开心是天性，是与生俱来的，是自然给予的。我们千万不要剥夺了孩子快乐的权利。进入少年，事情就麻烦起来，因为是从幼稚向成熟过渡的时候。又是在一个很特别的年代，有关“革命”，有关“斗争”，少年提前进入了成人的世界；而成年人，其实也很幼稚，也很盲目，有时也很冲动。这一切，都为共和国以后的历史做了铺垫。

我 的 家

成人前

这幢楼，这条街，都已经面目全非了。也许因为将要拆迁，不再维修而显得破败凋零。当然无可奈何，比起有的地方来，这里总算还能隐隐约约看到过去的影子。

武进路，地处虹口区中心，东起九龙路，经吴淞路、乍浦路、四川北路、江西北路，到河南北路止，很短，大约不到两公里吧。我家1948年搬来上海时就住在这里，整整住了四十年。

我家住的，是幢很奇怪的房子。现在大家常常说起的上海的典型建筑，什么花园洋房、高层公寓、新式里弄、石库门、棚户简屋，都不是。它是座两层楼房，朝南面对着一个相当大的花园。我家搬进来时，底楼是个仓库和一个咖啡馆。咖啡馆和仓库之间，有扇临街的小门上二楼。楼梯很暗，但很宽大；楼梯拐弯处有个十来平米的过厅，到二楼，又是个十几平方的过厅，再上两个台阶进入走廊。走廊右手是厕所，也有近十平方，马桶却是



这里的风景也已经变成历史。现在，这片破旧的房屋，包括曾经显赫的“海军司令部”都已经拆成平地。读者看到这本书的时候，或许这里又耸立起了新的高楼。幸好，还留下这些照片，还有记忆。

老式的蹲坑，因为公用而变得肮脏不堪。走廊两侧南北各三间房，朝南的房间大一些，朝北的小一些；到顶头下两个台阶，是个南北套房。这样结构的房子，是旅馆，是饭店，是办公楼，抑或是上海开埠不久中国人建造的不中不西的花园住宅？

当时二楼总共住了五户人家，楼梯口的过厅改成了共用的厨房。一楼半的楼梯拐弯处，还有个朝北的亭子间似的小屋，住着另一户人家。我家则把楼梯转弯处的过道用木板拦出一半作厨房，然后再向南破墙而出，在底楼咖啡馆的大厨房上面搭建了一间木结构的房子作卧室。所以我家的房间三面是木板，一面则是拉毛了的外墙，上面还有粗大的落水管道。别看是个不伦不类的违章建筑，作为住宅却相当舒适，因为它突出在花园里，又面南向阳，树木花草的清香伴着灿烂的阳光，给我的童年留下了明媚的记忆。

没过多久，花园改成了强生出租汽车公司的停车场，虽然风景不再，但视野依然开阔，窗前那棵粗大的广玉兰也保留着，供我们家搁晾衣杆。我常常伏在窗口，端详广玉兰肥硕的叶片和在五月开花季节饱满的乳白色的花瓣，浓烈的花香，至今还留在美好的回忆里。

对孩子来讲，这块停车场，有着特别的诱惑力。白天，出租车开走了，停车场空空荡荡，我们和看门的早已混熟，一个个溜进去，在空旷平整的场院里嬉笑奔跑，或者围着待维修的车辆捉迷藏，或者看工人检修车辆，甚至钻到车子底下去。城市里的孩子，有这样大的游戏场所，真是难得。

在我们家斜对面，隔着马路，有个“海军司令部”，是幢漂亮的红砖洋楼，前面也有个不小的花园。长大后知道海军司令部不在这里，但的确是属于海军的一处房产；或许是某个海军将领

的住宅，或是某个机关，反正戒备森严。因为戒备森严，所以特别引起我们的好奇，总是偷偷从黑铁门的缝隙里窥看里面的池塘、假山，以为比真正的公园还要好玩。后来，这个地方改为海军军官子弟幼儿园，戒备不那么严密了，我们就找机会偷偷溜进去。等到能溜进去了，这地方就不那么好玩了。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年夏天，刮台风。那时候的台风比现在厉害得多，我想是因为那时候没有现在这么多的楼房阻挡风的横行。那次狂风暴雨之后，不知是谁来通风报信，说赶快去海军司令部拣麻雀。那里已经是幼儿园了，但大家还是习惯地叫海军司令部。跑到那里，果然遍地麻雀，多数还活着，只是全身被雨淋湿飞不起来了。真是难以想象，怎么会有那么多的麻雀被风刮在地上。以后我再也没见过这种现象，也没见有文章记载过这样的现象。但记忆应该没有错，因为至今我依然清晰地记得那时拣麻雀的兴奋。竹篮一会儿就装满了，我们喜笑颜开地拎回家去。不一会儿，家家户户都支上了油锅；不一会儿，楼道里处处飘香。那年月吃的东西少，能够放开肚子吃油炸麻雀的机会仅此一回，所以永志难忘。

夏天的晚上，我们就在停车场门口乘凉。那个年代，没有空调，电风扇也是奢侈品，而气候似乎比现在要热得多。熬过一个难耐的白天之后，家家户户就都转移到了室外。太阳刚下山，就开始在马路上泼凉水，让晒烤一天后的水泥赶快降温。不宽的人行道立刻就被各式的板凳、藤椅、竹榻甚至行军床占领。停车场的大门很宽，而且有个长长的过道，过道上面是过街楼，白天晒不着太阳，阴凉；而过道那头连着开阔的场院，这里就成了风口。很难再找到更好的乘凉的地方了。乘凉的时候，大人们或聊天，或打牌，孩子其实是无所谓乘凉的，他们在人堆里穿梭奔跑，依

然一头一脸的汗。

停车场隔壁，有幢红砖楼房，那是座气派的房子，沿马路上四级台阶，是个轩厅，也有十来平方，上面有顶，淋不着雨，女孩子常在这里玩“造房子”或踢毽子。经轩厅进门，有个一两百平方的内天井，上下三面都是敞廊，里面有很多房间。想来总是一个大户人家的公馆。1949年后做了区卫生局，后来改为结核病防治所。

马路对面，有一家南货店和一家照相馆。我姐姐读小学的时候，有几年，她的着色大照片曾经放在照相馆的橱窗里陈列，让我们家很有点拥有明星的自豪。南货店旁有条小弄堂，弄口有个给水站，就是个公用的自来水龙头，卖水的。弄里的居民就聚在这里洗衣淘米，很像农村的河埠头。

上世纪50年代的上海，即使在市中心，也有着几分农村风光。

过节过年

过节过年

我父亲是中国银行的职员，1948年从温州调来上海时，银行的员工宿舍还在建造之中。那个位于万航渡路名为“中行别业”的居住区，相当于现今流行的联体别墅，一门一户，至今还属于高档住宅。那时候中国银行分房子，颇有民主之风，居然采取抓阄的方式。造好一批分一批，人人有份，谁先谁后，就靠手气了。父亲的手气不佳，直到1949年，中国银行并入中国人民银行，“中行别业”理所当然停止建造，我家就在搭建的木屋中长期居住下来了。

后来，父母后悔当时为什么没有另外找房子。50年代初期，找房子不难。但如果不是后来噪音骚扰，他们也不会后悔。他们不是对物质生活特别在乎的人。事实上，对于旧社会银行的留用人员，父亲的薪水大幅度削减了，从小康人家变为城市平民。八十元钱要养五口人，父亲还需不时地寄钱接济祖母，虽还不能说

贫困，也绝对需要精打细算。但在我的记忆里，他们是快乐的。父亲去世后，整理他的遗物，发现他断断续续记的日记，惊讶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，日记竟像中学生一般的阳光。这证实了我的儿时记忆，证实那个时代的人们物质匮乏而精神丰富。当然说精神丰富是不准确的。处于儿童时代的新中国，成年人的思想也简单得如同儿童。儿童总是快乐的。

那时候我们家很干净，干净的程度现在想来不可思议。比方说，地板是要用刷子刷的。不是猪鬃做的刷子，也不是尼龙刷子，那时还没有尼龙，是细竹签做的硬刷子。锐利的竹签在泡着老硷的热水配合下，轻而易举就把杉木地板缝隙里的污垢变成泥浆剔除出来，再用拖把用清水洗涤，麦色的杉木底色和暗红色的纹理立刻清晰分明。那是冬天，到了夏天，天天拖地，地板几乎就像桌面一样干净，就用不上刷子了。板壁也用硷水擦洗，擦玻璃则用报纸，利用报纸上的油墨，可以把玻璃擦得无限透明。我不知道是母亲特别爱干净，还是当时普遍的风气就是这样，或者是“爱国卫生运动”的驱使。反正到后来，父母渐渐老了，家里也渐渐脏乱了。

现在装修新居，对灯饰特别讲究，许多人家有几十盏灯。灯越来越多，对光线的敏感度却越来越低。那时候，我家房间里是一盏25支光的电灯，厨房是一盏2支光的节能灯。每逢过节，父亲就会把房间的灯泡换成40支光。40支光的灯泡立刻就像个小太阳，把房间照得通明透亮，节日气氛立刻降临下来笼罩全家。加上那个年代，因为物质的匮乏，节日的副食品供应和平时不一样，所以过节的气氛是从物质到精神非常全面。

节日分两大类。一类是革命节日，五一国际劳动节和十一国庆节，是放假的最重要的革命节日。革命节日的气氛有赖于政府的营造，也得到民众的热情呼应。白天游行，晚上放焰火和广场联欢，都是万众欢腾的。现在想起来，游行是很劳民伤财的举动。在大城市，几十万人上街，红旗、横幅、标语、彩车、锣鼓、少先队的仪仗队、各种方阵……参加游行的人，凌晨就要集合，解散已是午后，真正辛苦。50年代游行气氛最为热烈的时候，我还小，还轮不上成为游行的主体。看游行当然不那么辛苦，只剩下兴奋。

游行经过的主干道两边挤满观看的群众和维持秩序的纠察，于是和主干道交叉的马路统统变成了步行街。平时车水马龙的街道，突然可以大摇大摆地在马路当中行走，感觉特别新奇，是一桩很令人兴奋的事情。宽阔的马路立刻成为孩子的天下，是男孩女孩奔跑嬉闹的乐园；直到远远传来歌声、传来口号、传来锣鼓，知道游行队伍来了，才赶快奔到路口，想办法挤到大人的前面，或者爬上大人的肩头。

游行队伍先是在市中心的人民广场集合开会，然后分几路沿交通要道辐射开去，每一路有十来万人，从头看到尾要两三个小时。其实游行队伍很单调，无非是各种各样的旗帜和各种各样的人，彩车之类是很少的，但这两三小时，我们始终处在亢奋状态，跟着喊，跟着唱，直到队伍走完，还意犹未尽地跟在队伍屁股后面走一段，然后捡拾一柄纸做的小彩旗或标语，举着游回家来。

然后就盼天黑。晚上，人民广场是焰火晚会，往往集中放两次焰火，在焰火的间隙，则是广场联欢，演节目，跳集体舞。